

# 西周金文中的“异人同名”现象 及其对断代研究的影响

韩 巍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由新出金文资料及相关事例可知西周金文中普遍存在“异人同名”现象。而望簋与师望诸器、师汤父鼎与仲桷父诸器这两个典型例证则显示了以往西周铜器断代研究中忽视“异人同名”现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在铜器断代研究中运用“人名系联法”时,应该充分重视“异人同名”的可能性,尽可能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关键词:西周 铜器铭文 同名现象 断代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7.3

文献标识码:A

在西周铜器断代研究中,铭文内容的“系联”是一项基本方法。铭文内容一般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迹等要素,其中“人物”是最重要的一类。在郭沫若、陈梦家、唐兰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实践中,“人名系联法”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对金文人名称谓的规律认识不足,在使用“人名系联法”时存在过于简单草率的问题。比如将金文中的同一称谓直接认定为同一人,并将相关的铜器定为同时,这种做法在早期的断代研究中相当普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金文人名称谓进行了深入的综合研究,逐渐摸索出其中的一些规律。几位学者先后指出,金文中的人名称谓经常重复出现,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同一称谓认定为同一人,而应具体分析<sup>[1]</sup>。先秦人名称谓一般由姓、氏、名、字、排行、爵称、谥号等部分组合而成,不同类型的称谓包含的“成分”各异,其重复的概率也有很大差别。比如排行、爵称、谥号,不同家族、不同个人都可以使用,由这几种“成分”构成的称谓,重复概率就很高,像“虢伯”、“夔叔”、“公仲”等称谓,如果不参考其他信息,很难将其与某一个人相对应。姓、氏是家族的标志,由姓、氏和其他“成分”组成的人名称谓,可大致确定其出身的氏族或氏族,如“伯姜”是出身于某姜姓家族的长女,“虢姜”

是出身于姜姓而嫁给虢氏(姬姓)的女子,“荣伯”是荣氏家族的长子等等。但在这种情况下,仍不能断定某一称谓必属于某一个人,比如很多学者都曾指出,荣氏家族的每一代长子都可称“荣伯”,西周时期可能先后出现过多位“荣伯”。名、字是标志个人的符号,按理说其重复的概率较小,但是中国历代同名、同字的现象屡见不鲜,先秦时期亦不例外。清代学者王梓材就指出过先秦人名中的“祖孙相袭”现象<sup>[2]</sup>,同一国族尚且不嫌祖孙同名(字),不同国族之间当然同名(字)的可能性就更大了。盛冬铃先生曾用大量例证说明西周金文中存在的这种“异人同名”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断代研究中使用“人名系联法”的前提条件<sup>[3]</sup>,其见解得到不少研究者的重视。

下面结合近年新出金文,略举数例,对这种“异人”而“同名(字)”的现象做进一步的揭示。

## 1. 召

西周金文中名“召”者甚多。仅就长篇铭文而言,“召”自作的铜器有召鼎(5.2838)<sup>[4]</sup>、召壶盖(15.9728)以及近年发表的召簋<sup>[5]</sup>,其他铭文中出现的还有“宰召”(蔡簋8.4340、大师虢簋8.4251)、“士召”(克钟1.204)<sup>[6]</sup>。就年代来说,召簋最早,约当穆恭之际,召鼎一般定在孝王前后,召壶盖多定

收稿日期 2009-01-08

作者简介 韩巍(1978~),男,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史、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古文字与出土文献。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2009年度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综合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YJC77000kj.net

于厉王;“宰咎”大约相当于孝夷时期,“土咎”则活动于宣王中期。就担任的职官而言,咎簋器主受命“司奠馭马”,掌管奠(郑)地的马政,属于司徒系统的牧官;咎鼎器主受命“更乃祖考司卜事”,属于宗伯系统的卜官;咎壶器主则是“作冢司土于成周八师”,是总管“成周八师”的大司徒,地位显赫;“宰咎”是管理王室宫廷事务的近臣,“土咎”则属司寇系统掌管司法、监察的官员。可见,这五位名“咎”者的年代都相隔一定距离,而其职官又分属性质不同的系统,因此有理由认为他们是五个不同的人物。

## 2. 冉、冏父

西周金文中名“冉”者以往所见不多,但近年新出金文中发现不少。平顶山应国墓地M84出土应侯冏盃,“应侯冏”应是该墓之主,墓葬年代约在恭王时期,“应侯冏”大概是活动于穆恭之际的一代应侯<sup>[7]</sup>。2005年发掘的山西绛县横水墓地1、2号墓中,有多件铜器为“侂伯冏”所作<sup>[8]</sup>。墓葬年代应在恭懿之际,“侂伯冏”是媿姓小邦侂氏的君主。吉林大学吴振武教授曾介绍私人收藏的一件冏簋,年代亦在恭王前后,作器者“冏”是王朝贵族遣氏的小宗<sup>[9]</sup>。以上三位名“冏”者虽然年代接近,但分属不同的国族,显然不是同一人。此外,1973年陕西岐山县贺家村墓地M3出土一件荣有司冏鼎(4.2470),1975年附近的董家村窖藏出土铜器中有一件荣有司冏鬲(3.679),两器形态、纹饰均属西周晚期偏晚阶段,器主“荣有司冏”是大世族荣氏的家臣。西周金文中字为“冏”者也有数例。近年公布的猗盘、盂铭文中“师冏父”,其年代约在穆恭之际<sup>[10]</sup>。1981年南阳市郊砖瓦厂墓葬中曾出土仲冏父簋(8.4188-89),年代约在宣幽时期<sup>[11]</sup>。铭文表明器主“仲冏父”是南申伯的“有司”,官为“太宰”。这两位字“冏父”者年代相隔至少上百年,肯定不是一人。

## 3. 或

1975年陕西扶风庄白墓葬出土伯或诸器,当时吴镇烽等先生所作的简报将其与传世的录或卣(10.5419-20)、录簋(8.4122)、伯或簋(7.4115)、录伯或簋(8.4302)等器相联系,认为它们都是同一人所作<sup>[12]</sup>,其说至今仍有影响。不过李学勤、盛冬铃等学者指出,录或卣铭文中的“录”与“或”是两个人,作器者应为“录”而非“或”,此器应更名录卣;录伯或簋的“录”是国族名而非私名,“录伯或”与“录”也非一人<sup>[13]</sup>。从时代上看,伯或诸器是穆王标准器,录卣、录簋与之同时。录伯或簋铭文记录的是周王对录伯或的册命,其中的一些用语如“繇乃祖考有功于周邦,佑辟四方,惠弘天命,以及赏

赐物品如钅鬯、朱鬯斝等成套车马器,都是接近西周晚期时才流行起来的,因此其年代至早不过西周中晚期之际。伯或铭文有“唯用绥神,怀颺前文人,秉德恭纯”等语,其年代应与录伯或簋接近,作器者可能是同一人。但穆王时期的伯或与中晚期之际的录伯或显然不是同一人。

以上所举仅是几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实际上西周金文中的“异人同名(字)”现象还有很多,前引盛冬铃、吴镇烽文举例丰富,此处不再征引。

鉴于西周金文中“异人同名(字)”现象的普遍性,我们在使用“人名系联法”进行断代研究时,必须对这种可能性有充分的估计。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铜器断代研究中,学者对于使用“人名系联法”已经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纠正了过去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对于一些重复概率较大的人名称谓,比如“井伯”、“荣伯”,学者大多已不再将其简单视为同一人,而是结合其他背景资料,尽量区分其时代先后。但由于名、字这种称谓与个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其“异人同名”的可能性似乎没有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以致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以下仅举两个典型例证。

### 1. 望簋与师望诸器

宋代著录的望簋(8.4272)仅有铭文摹本传世,器形已失传,铭文中的册命地点在“周康宫新宫”。“新宫”这一地点又见于师汤父鼎(5.2780)、师遽簋盖(8.4214)、虎簋盖(近2.491)和殷簋(近2.487)等器,年代均为恭懿时期。望簋铭文中还有一位“史先”,此人多见于西周中期偏晚阶段的铭文,又称“内史先”。因此,学者多将望簋的年代定于恭王或懿王<sup>[14]</sup>。传世器还有一件师望鼎(5.2812),铭文记录“大师小子师望”作器,同一人所作之器还有壶(15.9661)、簋(6.3682)、盃(9.4354)各一件<sup>[15]</sup>。长期以来,学者普遍认为望簋器主与师望乃是同一人,故将二者定于同时,上引郭沫若、马承源、刘启益、白川静诸家均无异说。

近年彭裕商先生始指出,师望诸器的铭文格式、遣词、字体以及器形和纹饰都带有较多的晚期色彩,其年代不应早于厉王<sup>[16]</sup>。笔者在彭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师望诸器的造型、纹饰特征,论证其年代应在宣王甚至更晚<sup>[17]</sup>。因此,师望与望簋器主的年代相隔甚远。师望是“太师”的僚属,其头衔为“师”,属于武官“师氏”系统。而望簋铭文记录周王对望的册命,右者为宰侂父,望的职责是“死司毕王家”,即管理毕地的王室财产,显然属于周王身边的近臣,其官职很可能也是“宰”<sup>[18]</sup>。望的官

职,一属外朝,一属内朝,在周代世官制度下,两者集于一身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无论从年代还是从官职上看,这两位名“望”者都不太可能是同一人,应该是“异人同名”。

## 2. 师汤父鼎与仲柎父诸器

20世纪60年代,陕西永寿县好畤河村曾先后出土仲柎父鬲(3.746-752)、簠(8.4154-55)等铜器<sup>[19]</sup>,作器者称“师汤父有司仲柎父”,说明器主字“仲柎父”,是另一贵族师汤父的家臣。传世铜器有师汤父鼎(5.2780),铭文记录周王在“周新宫”之“射庐”赏赐师汤父弓矢等器;器腹倾垂明显,兽蹄形足,足根宽大,口沿下饰长尾顾首鸟纹,腹部饰垂冠、钩喙、卷尾的大鸟纹<sup>[20]</sup>。“新宫”、“射庐”这两个地点又见于十五年趯曹鼎(5.2784),该器铭文中出现“恭王”。此外,“新宫”还见于上文提到的望簠等器,其年代均在恭懿时期;“射庐”又见于匡卣(10.5423),该器铭文中出现“懿王”。因此,师汤父鼎多被学者定为恭懿时器<sup>[21]</sup>。同时,大多数学者将仲柎父鬲、簠铭文中的“师汤父”与师汤父鼎的器主看作同一人,从而认为仲柎父器与师汤父鼎大致同时,将其定为西周中期<sup>[22]</sup>。直到近年,仍有不少著作持这种观点<sup>[23]</sup>。

仲柎父鬲为平裆、蹄足,足根特别宽大,器身饰有顾首吐舌的螭曲夔纹,与传世的虢文公子钫鬲(3.736)以及三门峡虢氏墓地出土的虢季氏子钫鬲(3.683)、虢季鬲(近1.136-143)等极为相似<sup>[24]</sup>。虢氏墓地的年代上限,目前尚有不同看法,部分学者认为可早到西周晚期,也有学者认为最早不过春秋初年,笔者倾向于后说。虢季氏诸鬲的年代应在两周之际,有可能晚到春秋初期。仲柎父簠为敛口圈三足簠,耳部所饰兽头有耸起的双角,兽额部亦有形状相似的“角”,耳下的垂珥和圈足下的三小足都呈向外翻卷的象鼻状;盖顶及腹部饰瓦纹,盖缘及口沿下饰S形凸目窃曲纹,圈足饰垂鳞纹。与其造型、纹饰最为接近者,有宣幽时期的师寰簠(8.4313)、颂簠(8.4332-39)<sup>[25]</sup>,以及三门峡虢氏墓地M2001出土的虢季簠<sup>[26]</sup>。虢季簠与前举虢季鬲出于同一墓,其年代亦应在春秋初年。由此可见,仲柎父鬲、簠的造型和纹饰普遍流行于西周晚期后段至春秋早期。因此,仲柎父器的年代应在西周末年,铭文中的“师汤父”与师汤父鼎相隔甚远,应该是“异人同字”<sup>[27]</sup>。

以上两例充分说明了孤立运用“人名系联法”给西周铜器断代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应该说,今天的铜器断代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成

熟的方法。在有铜器实物或图像可以依据的前提下,首先应根据器形、纹饰以及铭文字体、文例等因素断定其大致的年代范围,然后再根据铭文内容涉及的人、地、事将其进一步划归不同的“组”,最后尽可能联系标准器推断具体的王世。这套“操作流程”的可靠性已经经过近百年的实践经验和无数新材料的验证。诚然,器形、纹饰的演变也并非直线前进,偶尔也会出现违反常规的“特例”,但与“异人同名”现象相比,其概率毕竟要小得多。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对使用“人名系联法”应该更加慎重。若要将几件与同一名、字有关的青铜器归为同一组,必须尽可能综合考虑其他各项因素,避免仅根据人名的一致来下判断。

[1]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第十七辑,中华书局1983年;吴镇烽:《金文人名研究》,收入专著《考古文选》,科学出版社2002年。

[2]《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68页。

[3]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第十七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50-53页。

[4]本文所用金文资料大多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直接在器名后用括号标注,形式为“卷数·序号”。另有部分铭文引自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年,标注形式同前,前加“近”字以示区别。

[5]张光裕:《新见望簠铭文对金文研究的意义》,《文物》2000年第6期。

[6]“土簠”又称“土簠父”,见于新发表的文盨铭文,参看李学勤:《文盨与周宣王中兴》,《文博》2008年第2期。

[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十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9期。另外保利博物馆所藏再簠的器主也是这位“应侯再”,见《保利藏金》,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74页。

[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考古》2006年第7期;《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9]吴振武:《新见西周再簠铭文释读》,《史学集刊》2006年第2期。

[10]吴镇烽:《虢器铭文考释》,《考古》2006年第6期;韩巍:《望簠年代及相关问题》,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六卷,文物出版社2007年。

[11]崔庆明:《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中国青铜器》,李学勤:《论中再父簠与申国》,皆载《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12]吴镇烽、雒忠如、罗西章:《陕西扶风出土伯或诸器》,《文物》1976年第6期。

[13]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71

- 页;前引盛文,第52页。
- [14]郭沫若首先将望簋定为恭王器,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80页;陈梦家亦将此器归入“恭王”目录下,见《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2页;此外,唐兰、马承源等学者也将望簋定于恭王(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425页;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1988年)。而刘启益和日本学者白川静都将望簋定于懿王(刘启益:《西周纪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8页;白川静:《金文通释》卷三上,白鹤美术馆1969年,第67页)。
- [15]师望鼎图像见陈仁涛:《金匱论古初集》,香港亚洲石印局1952年,第57页;师望壶见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34页;师望簋、盃分别见宋·王黼等:《博古图录》,卷十六、十八。
- [16]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第423~425页。
- [17]韩巍:《周原强家西周铜器群世系问题辨析》,《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3期。
- [18]与望簋年代接近的蔡簋(8.4340),右者为宰召,蔡的职责是“死司王家,外内毋敢有不闻,司百工,出入姜氏命”,与望非常相似,而蔡的官职正是“宰”。
- [19]吴镇烽等:《陕西永寿、蓝田出土西周青铜器》,《考古》1979年第2期。按:仲桷父器前后分多次出土。仲桷父鬲铭文见于著录者共7件,器形见于著录者共5件,其中3件现藏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四)》,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58~160页),两件现藏上海博物馆(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66~269页);仲桷父簋见于著录者有两件,一件藏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四)》,第156页),一件藏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青铜器》,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1962年,好畤河村还曾出土仲桷父匕(3.977)等铜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永寿县、武功县出土西周铜器》,《文物》1964年第7期),与以上诸器应是一人所作,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仲桷父鬲、簋,可能是这次出土流散者(参看沈之瑜:《仲桷父鬲跋》,《文物》1965年第1期;梓溪:《陕西永寿县出土青铜器的离合》,《文物》1965年第11期)。
- [20]器形参见《中国青铜器全集》第五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图二十九。
- [21]定为恭王的有郭沫若、唐兰、白川静、刘启益等学者,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册,第70页;《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424页;《金文通释》卷二,白鹤美术馆1968年,第391页;《西周纪年》,第314页。陈梦家先将此器归入恭王下,后又认为应移入懿世,见《西周铜器断代》,第162、209页。
- [22]沈之瑜:《仲桷父鬲跋》,《文物》1965年第1期;白川静:《金文通释》卷二,第396页;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卷,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7~149页。
- [23]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56页;刘启益:《西周纪年》,第315页;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下”,第268页。
- [24]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54、55页。
- [25]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87、88页。按:两器造型与仲桷父簋略有差别,耳上所饰兽头都吐出向内勾卷的长舌,师望簋的三小足为兽爪状。
- [2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45页。前举虢季高见该书第40页。
- [27]彭裕商先生根据仲桷父簋、鬲的器形、纹饰,将其定在宣王时,其说甚是;但他仍认为两位“师汤父”是同一人,因此将师汤父鼎定在西周晚期(《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第478页),则是不合理的。《殷周金文集成(修订版)》(中华书局2007年)第三册将仲桷父簋定在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合乎实际;但第一册将仲桷父鬲定在西周中期,则又与前说自相矛盾。

## The Name Repetition in the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Its Effect on the Dating Studies

HAN Wei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newly unearthed inscriptions and relevant cases show that there widely existed the ubiquity of the Name Repetition in the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However, two typical examples of Wang Gui (food vessel)& Shi Wang bronzes and Shi Tang Fu Ding (food vessel)& Zhong Nan Fu bronzes demonstrate th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dating of Western Zhou bronzes caused by ignoring the name repetition phenomenon. Therefore, researc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is phenomana when they use “Name Relating Method” in bronze time predicative studies, and consider other factors comprehensively.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Key words: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 name repetition phenomenon; dating.